

清道光时期朝鲜使臣对高句丽的认识

孙成旭

绪论

在朝鲜时期，士大夫一直认为高句丽是本国的历史，而随着不同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对明清认识的变化，对高句丽的认识也呈现出不同的观点。朝鲜初期，从小中华思想的角度叙述安市城之战，虽然强调高句丽强大的武力，但其内容多以唐朝及唐太宗为主要方面。唐太宗虽然在安市城之战中大败，但是在朝鲜士大夫的叙述中却多给予肯定的评价。而这样的叙述方法在壬辰倭乱以后发生了改变，壬辰倭乱给朝鲜国家带来了存亡的威胁，国内出现了自强救国的主张，因此经常借用安市城之战的内容鼓舞士气和人心，而朝鲜士大夫在壬辰倭乱以后对于安市城之战做了重新认识

关于朝鲜时代对高句丽的认识，特别是针对安市城之战的看法的变化研究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高句丽认识的变化，意味着摆脱小中华思想，发展成为近代民族意识的持续加强的过程。对高句丽认识的变化是走向“近代”的过程。第二种观点认为，从批判第一种观点出发，对高句丽的认识变化不是持续的发展，而是在不同时期的国内环境变化中断续的出现。这两种看法主要是针对朝鲜初期至18世纪时期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的，而针对于19世纪的相关研究却寥寥无几。但是要考察朝鲜士大夫对高句丽的认识变化是不是与近代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史学发展有关，就必须针对于十九世纪他们对高句丽的认识进行研究。通过对十九世纪的研究，就可以弄清对高句丽的认识到底是持续的还是断续的。

为了探讨上述的问题，笔者关注十九世纪的燕行录。燕行录是考察朝鲜士大夫对高句丽认识的非常重要的史料。在朝鲜初期，虽然燕行录中开始有高句丽相关内容的存在，但是数量较少且内容较为松散，从壬辰倭乱以后开始，这一方面的内容开始增多，十八世纪以来燕行录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大有提高，朝鲜使臣路过高句丽故址至北京，沿途在燕行录中记载了许多对高句丽的见闻及认识。本文是在上述问题意识下，主要针对于十九世纪，尤其是清道光朝时期的燕行录进行分析及探讨，特别是以燕行录中所记载的有关高句丽的内容为主进行讨论。

第一章 对19世纪前朝鲜燕行录中所记载的高句丽的记述的认识¹

1392年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了李氏朝鲜王朝，并宣布即位。由于李成桂对明朝正统

¹ 此部分内容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关于朝鲜时期对高句丽的认识可以参考郑镇宪：《朝鲜时代의 高句丽 认识》，《高句丽研究》第18辑，2004年12月；韩明基：《朝鲜时代 韩中 知识人의 高句丽 认识》，《韩国文化》38，2006年。虽然以下论文不是专门针对朝鲜燕行录中所记载的高句丽的记述为中心的，但是论文中包括许多相关的内容。정훈식：《朝鲜后期 燕行录에 나타난 辽东》，《韩国民族文化》第29号，2007年；이승수：《燕行路上的 空间 探索，鳳凰山城 -安市城说과 관련하여-》，《文化研究》第29卷第2号，2006年6月；이승수：《朝鲜后期 燕行 体验과 古土 认识 -东八站을 중심으로-》，《东方学志》第127辑，2004年9月；苏在英：《燕行의 山河와 燕行使의 历史认识》，《东洋学》第35辑，2004年4月。在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一致认为，朝鲜时期从开国到灭亡士大夫，对于高句丽的认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也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本章主要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补充一些史料，简单叙述朝鲜建国至18世纪末，朝鲜士大夫对高句丽的认识，特别是燕行录中关于高句丽的记述。

地位的认同，使得确立了一系列与明朝的交往政策。虽然在双方交往中不断出现摩擦，但李成桂始终认为明朝是中华的正统。在政治上李成桂则运用朱熹的思想作为指导的原则和方略，思想上则遵从华夷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士大夫认为高句丽的灭亡本身是由于高句丽高估本国国力，一味抵抗唐朝，最终自取灭亡的，而认为唐太宗在贞观之治中表现出了明君的风范，应该作为学习的榜样。在整体上虽然肯定唐太宗，但对于唐太宗的征战失败也给予了批判，但也只是从唐太宗未听取谏言，贸然出兵这一方面来批判，而并非从高句丽方面出发给予唐太宗评价。在这一历史上，朝鲜士大夫都是以儒家的角度来进行评判的。

上述针对唐太宗的看法从朝鲜前期的燕行录中也可以得出反映。其中多此提到驻蹕山一地。驻蹕山²，驻蹕是指帝王出行时沿途停留暂住之意，唐太宗亲自出征，与高句丽展开战斗。唐军力克辽东城之后，在安市遭遇顽强抵抗，因天寒地冻，被迫撤退，无功而返。后唐太宗又两次率兵攻打高句丽，都以失败告终。驻蹕山是唐太宗指挥作战的所在地，并留有记功的石刻。1548年，崔演³以朝鲜冬至使的身份路过驻蹕山，并作诗一首：

先王耀德不观兵，笑杀唐皇苦远征。
万乘光临环寓宅，千钧羞与小鬮争。
当年漫有镌功颂，异代犹传驻蹕名。
最恨魏公今葬久，斜阳立马独含情。⁴

诗中描写唐太宗东征高句丽的内容，但是却并未提起高句丽，全部围绕着唐太宗进行描写。诗中魏公即魏征，是唐朝著名政治家，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唐太宗在出征高丽前，虽然也有大臣直谏反对出征，但是唐太宗还是一意孤行。在兵败高句丽后，唐太宗后悔发动了这场战争，说如果魏徵还活着，魏徵一定会劝阻他不要发动这场战争。⁵从诗中前六句可以看出诗人批判唐太宗东征之举，但最后两句表面是感叹魏征的早逝。而诗人实际是想表达唐太宗对于出兵的后悔，并希望臣子应具有魏征一样的胆识，不怕死亡直言进谏的精神。

1578年，梁应鼎⁶以圣节使身份，路过驻蹕山时也作诗一首：

西来百万转风雷，拔地巖峰帐殿开。
日角照临宁复覩，不论穷黠想雄才。⁷

与上首诗相似的是诗中内容也只是针对唐太宗，而并未提及高句丽。诗中不但描写唐太宗的行动之震撼，还表现出诗人对唐太宗的思念之情，因此才写出了“不论穷黠想雄才”这样的话。

1574年出使明朝的许葑⁸，路过驻蹕山时，对唐太宗东征进行了评价。他刻薄地说：“首山即唐太宗驻蹕山也，唐太宗之得志也。鞭笞四夷，所向无前，气盈意溢，自以为除凶雪耻，天下莫敢梗吾前。而乃以百万之师，遗巡于一城之下，挫折而归，为后世笑，何其馁也。复立

² 今辽宁省辽阳市西南的首山(即马首山)、北宁市西北的医巫间山及海城市西南的平顶山。

³ 崔演(1503-1546)字演之，号艮斋，是朝鲜王朝后期的文臣，曾任弘文馆修撰、都承旨、刑曹判书等官职。1584年以冬至使身份出使明朝，但回国的路中病死于平壤。在出使中，写下了《西征录》。著作有《艮斋集》等。

⁴ 崔演：《西征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三，首尔：东国大学校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第183页。

⁵ 《资治通鉴第》卷198中记载：“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⁶ 梁应鼎(1519-1581)字公燮，号松川，是朝鲜王朝前期的文臣、学者、诗人。曾任修撰，晋州牧使 庆州府尹，工曹佐郎，大司成等官职。1578年以圣节使的身份出使明朝。文集有《松川遗集》、《龙城唱酬录》等。

⁷ 梁应鼎：《松川遗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7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89年，第509页。

⁸ 许葑(1551-1588)字美叔，号荷谷，是朝鲜王朝中期的文臣，曾任典翰，昌原府使等官职。1574年担任书状官出使明朝，写了《荷谷朝天记》。文集有《荷谷集》、《荷谷粹语》。

文贞之碑，暖其脱矣，遗迹依然，使人有千载不平之意”⁹。虽然话语如此刻薄，但依旧还是从儒家标准来批评的，没有从高句丽方面进行评判，更是在批评中把高句丽称之为“夷”。

燕行录中是何时以高句丽为主体开始记载的呢？在壬辰倭乱带给朝鲜国家存亡威胁的情况下，以唐太宗为主观点发生了改变。壬辰倭乱后，朝鲜士大夫为了恢复国力、维持国家的安定秩序，主张自强。他们借用安市城之战中以多打少最终胜利为例子，来支持他们的主张，而这种认识在丙子胡乱以后更为加强。通过这两场战争，朝鲜士大夫给予安市城之战做出新的评价，在叙述安市城之战时，叙事重点也从以唐朝为主的内容变为以高句丽方面为主。而在朝鲜后期，这种叙述方式和观点成为对安市城之战的主要看法。

两乱以后，朝鲜士大夫开始关注安市城战斗，随着关注的增加对于安市城地点问题的关注也不断增加。¹⁰ 17世纪初，有些朝鲜士大夫提出了凤凰城就是安市城的看法，如：1610年出使明朝的赵纬韩¹¹路过凤凰城时说：“凤凰城，或曰安市城，或曰莒州城。安市则杨万春之所守。莒州则盍苏文所据也”，并留诗：

几叠青山古战场，周遭十里拥金汤。
连墙冠岫干星汉，列堞婴峦束剑鋌。
行客谩疑安市迹，居民犹说盍苏强。
悠悠往事凭谁问，一抹螺鬟带夕阳。¹²

赵纬韩在诗中虽然也不能确定安市城的具体位置，但是最后还是给出了凤凰城即为安市城的主张。到17世纪中叶，朝鲜内部对于凤凰城即为安市城的看法已十分普遍，因此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在路过凤凰城时便会不自觉地联想起安市城之战。例如：1651年黄昇¹³以进贺谢恩兼冬至使之副使身份出使清朝，在路过凤凰城时，曾作七言律诗：

凤凰山麓古荒城，安市犹传旧邑名。
城压上流通鸭水，山围旷野控燕京。
版图久变凭谁问，寨栅新开点客行。
却想当年拜天子，勿云东国少豪英。¹⁴

还有，1660年姜栢年¹⁵以三节年贡使之副使身份路过凤凰城时，在《燕京录》记载道：

⁹ 许葑：《朝天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六，首尔：东国大学校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第133页。

¹⁰ 参见이승수：《燕行路上的空间探索，凤凰山城-安市城说과 관련하여-》，《文化研究》第29卷第2号，2006年6月

¹¹ 赵纬韩（1567-1649），籍贯汉阳，子持世，号玄谷、西峦、素翁，是朝鲜王朝中期的文臣。曾任持平，修撰，同副承旨，直提学，工曹参判等官职。1610年以谢恩使的书状官身份出使明朝。著有《流民叹》，《玄谷集》。

¹² 赵纬韩：《玄谷集》卷五，《（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3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0年，第217页。

¹³ 黄昇（1604-1656），字子由，号漫浪，是朝鲜王朝中期的文臣、学者。曾任副修撰，校理，大司成，大司谏等官职。1637年担任通信使之从事官到日本。1651年担任书状官到清朝，在路途中创作了许多诗文。文集有《漫浪集》。

¹⁴ 黄昇：《漫浪集》卷八，《（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03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3-1995年，第438页。

¹⁵ 姜栢年（1603-1681）字叔久，号雪峰、闲溪、听月轩，是朝鲜王朝后期的文臣、学者。曾任同副承旨，大司谏，清风郡守等官职。1660年以冬至副使的身份出使清朝，写了《燕京录》。文集有《雪峰集》、《闲溪漫录》等。

安市孤城在路邊，英雄陈迹尚依然。
早寒已觉旋师日，大节终彰拜帝年。
遗礎纵横衰草里，鵝垣廖落乱峰前。
临歧指点悲吟际，几遗征人举马鞭。¹⁶

从黄昇与姜栢年的诗中可以很明确的看出他们的记载方法，已与从前大不相同，记载的主体也不再以唐太宗为主体记述，而是变为以高句丽为主体叙述，这样的变化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针对于安市城之战的回忆与对安市城的关心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由于这时期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历史地理的关心的增强，对于安市城的具体位置也出现了争论，比如：南九万¹⁷以谢恩兼三节年贡使之正使身份于1684年出使清朝路过凤凰山，并在《药泉集》中说道：“象胥辈指之曰：此乃古安市城。余疑其城太阔，难于防守，且唐宗行师。应从海边坦道，而此地前后川岭险塞，恐有不然者。取考大明一统志云：金州卫东及辽东都司，城东三百六十里，有两凤凰山，而皆唐太宗驻蹕处。又云：安市废城在盖州卫东北七十里，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贵白衣登城即此。又云：鸭绿江流至安市城下入海，唐太宗耀兵于鸭绿水即此。以此推之，栅门外凤凰山，乃是都司城东三百六十里，而非盖州卫东北七十里。距鸭绿江几至三日程，而非其入海处，则指此谓安市城者，果何所据耶。盖唐宗之征高丽，循海而东，金州、盖州皆其行军之路也。驻蹕於金州之凤凰山则固然矣。至於栅门外凤凰山，似因山名之偶同。一统志有此两认之说，而我国之人传闻太宗之所驻蹕，又指为安市城。独不知一统志所载安市城，自有其处，转辗欺诬，至於如此，可哈也已。闻义州人言，鸭江入海处西岸，有废山城，名高牟云。未知此或是一统志所谓安市废城耶。聊赋一律，以谗后人”。¹⁸

“朝鲜前期，朝鲜士大夫认为安市城应在朝鲜半岛以内，倭乱以后，认为凤凰城就是安市城这一看法，是在更加扩张高句丽领土的认识下出现的”。¹⁹1780年以朝鲜使团随行一员出使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记录了上利用文献对安市城的位置进行的几种假设。他在批判凤凰城就是安市城这一看法的同时，对汉四郡、溟水、旧平壤的位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及胜国时王氏高丽，辽东及渤海一境盖入契丹，则谨画慈、铁两岭而守之，并弃先春、鸭绿而不复顾焉，而况以外一步地乎？虽内并三国，其领土武力远不及高氏之强大。后世拘泥之士恋慕平壤之旧号，徒凭中国之史传，津津隋唐之旧迹，曰此溟水也、此平壤也，已不胜其迳庭，此城之为安市、为凤凰，恶足辨哉？”²⁰而朴趾源这一看法也是在高句丽领土扩张这一意识下出现的。虽然朝鲜士大夫对安市城的位置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却没有人能确定，并实地考证自己说法的。

小结本章，可以看出在两乱以后朝鲜士大夫对待高句丽的思想及看法出现了明显变化，而随着这一变化，对安市城之战以及安市城位置的兴趣也不断上升，因此燕行录中有关的记录也不断增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这一下看法是否会得以继续延续，还是将如何变化，下一章将会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¹⁶ 姜栢年：《燕京录》，《燕行录全集》第19卷，第428页。

¹⁷ 南九万（1629～1711）字云路，号药泉、美齐。朝鲜王朝仁祖、肃宗年间的文臣。籍贯宜宁。司马试、别试文科及第，成为所任的核心人物。曾任大司谏、承旨、咸镜道观察使、领议政等官职。南人得势后，被发配到江陵，甲戌狱事后重新起用为领议政。1684年，以谢恩兼三节年贡使之正使出使清朝。著有《药泉集》，留下的诗调有《东窗已放亮》，《云雀在歌唱》等。

¹⁸ 南九万：《药泉集》卷二，《（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32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4年，第444页。

¹⁹ 许太裕：《朝鲜后期 中华论争 历史认识》，首尔：아카넷，2009年，第166页。

²⁰ 朴趾源：《热和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第二章 道光时期朝鲜燕行录中所记载的高句丽的记述的认识

19世纪燕行录所记载的高句丽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安市城战斗的内容与18世纪所记载的数量相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本章主要探讨道光时期(1821-1850)的燕行录中记载的有关高句丽的内容。道光时期，朝鲜王朝共派使臣出使清朝约六十三次²¹，在现今保存的燕行录《燕行录全集》与《燕行录全集·日本收藏篇》中共收录了十九种，这十九种燕行录如下：

出使时期	作者	书名	使团中作者的身份
1822	金学民	蓟程散考	副使金启温的弟子军官
1823	徐有素	燕行录	书状官
1825	无名氏	随槎日记	
1826	洪锡谟	游燕藁	正使洪羲俊的弟子军官
1828	无名氏	赴燕日记	
1828	朴思浩	燕蓟纪程	正使洪起变的军官
1828	金芝叟	西行录	
1829	无名氏	随槎日记	
1829	朴来谦	沈槎日记	书状官
1829	姜时永	翰轩续录	书状官
1831	郑元容	燕行日记	正使
1832	金景善	燕辕直指	书状官
1837	金贤根	玉河日记	正使
1842	赵凤夏	燕蓟纪略	书状官
1846	朴永元	燕行日记	正使
1848	李遇骏	梦游燕行录	
1849	黄某	燕行日记	医员
1849	李启朝	燕行日记	正使
1850	权时亨	石湍燕记	

这十九种燕行录中所记载的高句丽内容大多比较简略，其中记载较为详细的有金学民、朴思浩、郑元容、金景善、李遇骏等。在朝鲜使臣路过平壤，安州，凤凰城以及松站时，出现高句丽的内容较多，以下将分别叙述这四站并进行分析。

平壤为朝鲜时期的游览胜地，包含许多自然风光及古迹。在到达平壤后记录有关高句丽内容的只有两人：1822年出使的金学民和1828年出使的朴思浩²²，记载的内容均与忠武祠有关。金学民在《蓟程散考》中这样介绍忠武祠：“祠为奉乙支文德、金良彦两人而设也。唐太宗之征高丽也。文德能奋手独出，且战且进，使隋家百万之众，攒手奔北，东土生灵，至今有按堵之者，皆文德功业。良彦亦于甲子适乱以本邑人有奋旅之功业，尚今香火不绝”。²³ 朴思浩在《燕蓟纪程》中说“忠武祠，乙支文德及金良彦妥享之所也。文德值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时，奋起独战，使唐家百万之师，攒手奔北。良彦倡义，效劳於甲子适变。香火之设。有以也”²⁴。

²¹ 根据《同文汇考》补编与《朝鲜王朝实录》统计出来的次数。道光时期朝鲜出使清朝约六十三次。其中首次出使为1821年正月初七派进贺兼谢恩使，最后一次出使为1850年3月30日派陈慰兼进香使。

²² 朴思浩(1784-1854)字诚夫，号心田，籍密阳。他一生没有担任过中央官职，只担任过江原道观察使的裨将等小官职。1828年以谢恩兼冬至使之正使洪起变的军官的身份到清朝，写了《燕蓟纪程》。1837年，以奏请兼谢恩使之副使赵秉铉的裨将的身份再次到清朝，这次留下了100余首诗。文集有《心田稿》。

²³ 金学民：《蓟程散考》，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 日本所藏编》第1卷，首尔：东国大学校文学研究所，2001年，第501页。

²⁴ 朴思浩：《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第85卷，第218-219页。

从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两人介绍了忠武祠的情况，并赞颂了乙支文德的功业。但相较于燕行录中对平壤其他名胜古迹的记载来看，仅两人介绍忠武祠的内容的确不能称之为多。

使臣在路过安州时会自然的联想到：乙支文德，清州江及七佛寺。传说乙支文德在清州江率军打败隋军，其中还流传下了七佛寺的故事。燕行录中记录七佛寺内容的使臣有：金学民，朴思浩，赵凤夏，李遇峻。其中金学民与朴思浩在平壤记录过忠武祠，而在安州也简要介绍了七佛寺的传说。1828年出使清朝的朴思浩在《燕蓟纪程》说“七佛寺在玄武门外。按隋炀帝使宇文述，东征高句丽，师到清川江，江水涨流，未量其浅深，观望未渡。忽有七僧摄衣从下流渡去，宇文军随，而中流渐没，尽为滄死。水为之壅流，僧因忽不见，化为石弥勒，散在清川江边。因其所立之处，建弥勒院以庇之。又铸大梵钟，悬於佛楼上西轩，刻记七佛事顛末云”²⁵。从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朴思浩认为乙支文德之所以能取到胜利，与七僧的帮助密不可分。至于七僧到底是乙支文德战争部署的一部分，还是上天之意，我们现在也无法得知了。

1842年出使的赵凤夏²⁶也在路过安州之时介绍了七佛寺，但是他在记录中对这一传说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说：“七僧因忽不见化为彌勒，院立彩阁以庇其石，至今尚存异哉。七僧也，神歟？佛歟？佛楼西轩，刻记七佛旧蹟，而不能录焉”。²⁷从句中可以看出，作者第一怀疑这七僧是否真实存在过，第二怀疑七僧的本质。对于七僧是人是佛的质疑记录者也无法给予答案，而七僧是佛或是神直接影响着如何正确判断七佛的本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虽然作者回忆了此传说，但实际并没有说明高句丽的国力如何强大，反而还引起了质疑。

由于当时朝鲜内部普遍认为凤凰城就是安市城，朝鲜使臣到达栅门后会回忆起安市城之战。在道光时期朝鲜使臣的燕行录中，除去1828年无名氏所写的《赴燕日记》和1849年李启朝所写的《燕行日记》以外，其他的燕行录中均有关于安市城的记录。记录中有人认为凤凰城就是安市城，是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时，杨万春在此打败唐军的地方。如：金学民在《蓟程散考》中说道：“凤凰城，今属奉天，府城之东南十里许，有石峰峭峻拍拍，如凤翼之飞，谓之凤凰山。城之南开洞稍广，是谓安市城。唐太宗伐高丽时，驻蹕于此，至今城址犹存云云。”²⁸朴思浩也在《燕蓟纪程》中说道：安市城，在栅门五里许。昔唐太宗动天下之兵，东征高句丽，安市城主杨万春，坚城固守，终不能下，仍以回军。万春于城上拜送，太宗赐缣以褒之，时李靖尉迟敬德，临海王道宗等，百计攻城。又得辽东薛仁贵，席卷辽野，而一片孤城，能婴其锋，使中原戎马，不得蹂躪于鸭江以东一步之地，岂不壮哉。世传太宗于安市之役，箭中一目，因此回军，而中国史讳之云”。²⁹

此外也有人认为无法确定凤凰城就是安市城，而是介绍了前人提出的其他地点及主张。其中，1829年无名氏在《随槎日录》中说道：“自栅而北望五里许，山势匿匿雄秀，此为安市城而。或云，高句丽宝箴王时，此地属朝鲜，高宗攻安市城，六十日不下，而回军，守将登城拜谢，太宗赐绢白匹。唐太宗东征记，安市城主杨万春云。或云，辽阳开平县有安市城。又云，我国安州古安市城云。未知何据自安市城”。³⁰还有1850年权时亨在《石湍燕记》说道：“望见一座大山，横截西北，有龙飞凤舞之势，与是凤凰山郡，山中有安市城，即唐时盍苏文所口处，而太宗败绩于其下云。或云，安市城在辽北，此则非也。或云，辽人称火鸟曰安市，凤为鸟之大者，故凤城谓之安市城。未详其是否”³¹通过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朝鲜士大夫对安

²⁵ 朴思浩：《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第85卷，第222-223页。

²⁶ 赵凤夏（1817-1891）子商皓，籍贯丰壤，是朝鲜王朝后期的文臣。曾任奎章阁待教、都承旨、汉城府判尹、吏曹判书等官职。1842年担任冬至兼谢恩使之书状官的身份出使清朝，写了《燕蓟纪略》。

²⁷ 赵凤夏：《燕蓟纪略》，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第2卷，首尔：东国大学校文学研究所，2001年，第109页。

²⁸ 金学民：《蓟程散考》，《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第1卷，第501页。

²⁹ 朴思浩：《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第85卷，第251-252页。

³⁰ 无名氏：《随槎日录》，《燕行录全集 日本所藏编》第2卷，第25-26页。

³¹ 权时亨：《石湍燕记》，《燕行录全集》第90卷，第342-343页。

市城的推测主集中在三个地点：（1）凤凰城即安市城，（2）辽阳开平县³²，（3）朝鲜国内的安州³³。而这些说法是随着18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³⁴而提出的，到了19世纪依旧有很多士大夫保持着凤凰城不是安市城的看法，但也没有进一步去考证这三个地点。对于第一个地点，由于文献上的限制性，他们主要以《大明一统志》中的记录为依据，但是为了巩固这一说法需要挖掘新的文献资料。并且虽然许多出使者认为凤凰城就是安市城，但是当它们到达栅门后，由于与清朝官员的许多事务交接，因此没有时间和机会到凤凰城亲自查证，如：赵凤夏在《燕蓟纪略》中提到：“安市城在栅内北区五里许。唐太宗征高丽时，丽将杨万春守城，不下之处，而今番忙未见，明春回还时期欲往见。”³⁵有使臣在回程中探访过安市城，也记录过离栅五里的地方山势险峻，是适合防守的好地方，并且还存在着一些人为的遗址。但是使臣中对于此地势能否长期驻扎几万人这一问题又存在着异议。如：1832年出使清朝的金景善在《燕辕直指》中指出：“自栅北行五里而至，东西北三面皆石壁嵒绝，山脊往往有累石为城之基，惟南一面稍平，旧时城门在此云”。但是由于金景善也不能确定是否能长期驻扎数万兵士一事，因而并没有记录，而是在书中引用了前人的不同观点：“而稼记曰：城周不过数百步，即此弹丸小城，非大军久淹之地。恐是高句丽时，小小城堡，而且其城制，似我国人所筑云云。湛记曰：盖此城虽十里之周，其因山为固，不费防御者八九里。外险内平，可容数万人，时当久旱，水泉丰溢，实天险金城也。此地或称安市城，想唐太宗以天下兵力，攻之数月，云梯距闾，终不得施其功，岂惟城主之材力过人，必其地利有以制之也。此其安市也无疑矣云云。两说不同，未知孰是”。³⁶

上述这些内容都是针对安市城地理位置所记录的，除此以外有洪锡谟³⁷和郑元容³⁸，他们在回忆安市城之战时，融入了个人的感情色彩而作诗或书写文章，1826年出使的洪锡谟在路过凤凰城时作诗一首：

峰势葱茏入眼明，路过安市暂停行。
一夫杨将能弯矢，万乘唐皇昔逗旌。
大国数奔犹遗耻，故墟荒落更伤情。
顿无惨淡边山色，曠发林峦接凤城。³⁹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赞美杨万春打败唐太宗大军的进攻，强调唐太宗的耻辱，并且怀念高句丽的强大的国力，对于已经成为废墟的遗址，作者表现出悲伤的情感。1831年出使清朝的郑元容也在经过此地时作诗，诗中描写了乙支文德打败隋炀帝军队和杨万春打败唐太宗大军的内容，

³² 一些朝鲜士大夫根据《大明一统志》中的内容否定了凤凰城即为安市城的看法。在《大明一统志》中记载：“安市废县，在盖州卫东北七十里，故铁州，金为汤池县”。而根据这一记载，朝鲜士大夫在盖州卫东北七十里的范围内，推测了几个位置，其中辽阳开平县为其中之一。

³³ 针对于安州的说法，主要根据金时习(1435-1493)在路过安州时所作诗内容：安市城头叶正黄，客中秋思正茫茫//兴亡百变山依旧，云水千里事已荒//日落江波迷去雁，风吹枯草咽啼螿//荡荡萨水滩声急，不是悲秋即断肠。（《梅月堂诗集》卷之九）但针对于这一说法，19世纪的朝鲜士大夫并不十分同意，并且大部分认为安市城应处在鸭绿江以北。

³⁴ 关于朝鲜后期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参见朴仁镐的《朝鲜后期 历史地理学 研究》（首尔：以会出版社，1996年）与《朝鲜时期 历史家斗 历史地理认识》，首尔：以会出版社，2003年。

³⁵ 赵凤夏：《燕蓟纪略》，《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第2卷，第117页。

³⁶ 金景善：《燕辕直指》，《燕行录全集》第72卷，第202-203页。

³⁷ 洪锡谟(1781-1857)子敬敷，号九华斋、近窝、陶厓、望西堂等，籍贯豊山，是朝鲜王朝后期的文臣。曾任大学掌议、黄洞县监、南原府使等官职。1826年他的父亲担任冬至使之正使的身份出使清朝时候，他以正使的子弟军官身份去清朝，写了《游燕藁》。著有《有陶厓诗集》，《陶厓诗文集》，《赏心录》等。

³⁸ 郑元容(1783-1873)子善之，号经山，籍贯东莱，是朝鲜王朝后期的文臣。曾任江原道观察使、礼曹判书、吏曹判书、右议政、左议政、领议政、中枢府判书等官职。1831年担任冬至使之书状官的身份出使清朝，写了《燕行日记》。著有《经山集》、《黄阁章奏》、《北征录》等。

³⁹ 洪锡谟：《游燕藁》，《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第1卷，第594页。

更进一步表现出恢复故土的渴望，诗中说：“安得猛将养貔貅，攻取战胜使心快。一举还我旧疆域，铜柱划界医州界。北之先春南对马，前代版籍按图书”。

19世纪燕行录中关于高句丽的记忆最后出现的地方为松站，松站又名薛刘站，使臣们认为此战的名称十分有趣，因此对其进行了简单的记录。1829年出使清朝的姜时永在《翰轩续录》中说到“二十八日。晴寒。早发历松站，一名薛刘站。唐太宗东征时，薛仁贵刘仁愿驻兵出云”⁴⁰。关于松站的记录大多如以上的记录，不包含任何民族意识和感情色彩。

总结第二章，道光时期，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对于高句丽的记录共出现于四个地方：平壤，安州，凤凰城，松站，这与18世纪关于高句丽的记录有大规模下降，原因为，首先，道光时期很多士大夫开始质疑凤凰城就是安市城的说法，在路过凤凰城时便可能不会刻意回忆起安市城之战，因此对于安市城及安市城之战的记录内容也就越来越少；第二是，18世纪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的看法。而19世纪与18世纪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没有更多的资料的支持，加之去实地考察的困难，因而历史事实也就无从得到考证，更无法提出更多的有异于前人的看法。本人认为，由于上述的一些原因，致使19世纪的士大夫对于高句丽的历史事实及看法也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第三章 道光时期朝鲜燕行录中所记载的其他历史记忆

燕行录中不仅只记录高句丽一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包括燕行使者出使路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风景古迹等内容，主要是针对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的记忆以及箕子朝鲜与檀君朝鲜的记忆，而1811年暴发的洪景来之乱也被收录在燕行录中。这些记录是否与高句丽的记录一样逐渐减少呢，从燕行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减少，本章主要简单介绍一下道光时期燕行录中其他方面的记录。

首先，在燕行录中汉城至辽东城这一范围的历史古迹及历史记忆中，金学民在《蓟程散考》中记载：

坡州(临津江)：花石亭
开城：满月台，青石洞
平山：太白山城
瑞兴：瑞兴长林
凤山：凤山
黄州：洞仙岭，舍人巖，舟隅野，月波楼，竹楼，太古亭
平壤：大同江，练光亭，九畴坛，任贤书院，忠武祠，武烈祠，浮碧楼，清流碧，箕子庙，婵妍洞
安州：望京楼，忠愍祠，百祥楼，七佛寺，清川江
嘉山：晓星岭，纳清亭
定州：五龙浦，两朝纪蹟碑
郭山：九曲岭
宣川：倚剑亭，步虚阁，挂弓楼
义州：箭门岭，来薰门，统军亭，聚胜堂，迎春堂，来宣阁，白马山城
栅门至辽城：九连城，凤凰城，葱秀，松站，青石岭，白塔，太子河

从以上路程中可以看出记载最多的地区是平壤。平壤是朝鲜第一游览胜地，是保存箕子朝鲜，檀君朝鲜以及高句丽三朝古迹最多的地方。朴思浩在《燕蓟纪程》中说：“平壤第一江山也。”

⁴⁰ 姜时永：《翰轩续录》，《燕行录全集》第73卷，第43-44页。

檀箕以来至今五千年繁华之场，国内名胜无与相埒。自永济桥，向大同江，江之南十里。长林沿江，夹路风帆，沙鸟隐映於其中。林尽而彩阁粉堞，临江突起，映带缥缈，宛开一幅活画。令人已觉神气爽然”。⁴¹

平壤处处是可以缅怀历史的风光古迹，而使臣到达平壤后回忆最多的历史王朝就是箕子朝鲜。17世纪末18世纪初，朝鲜为了强化正统论及小中华思想，箕子就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根据。在平壤有许多与箕子有关的历史古迹及书院，而在当时并没有文献上的证明，致使许多人怀疑这一事实。但是朝鲜士大夫认为朝鲜是箕子的根据地，箕子在到达朝鲜后开辟了小中华思想。因此也常常把平壤称为箕城。李遇骏到达平壤仁贤书院后作诗一首记到：

斯文独赖九时书，箕圣遗风此有余。
白马东来今几岁，居人指点井田墟。⁴²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士大夫对于箕子的怀念。而对于箕子的记录与第二章中路过平壤记录高句丽的内容相比要多出许多。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是丙子胡乱战争有关的记忆，与此记忆相关的记录有统军亭（此亭西边有寿星村与清阴先生碑）和青石岭。例如：赵凤夏登统军亭后说，“统军亭在城内之北顶，雄伟轩厂，直压鸭绿江，江之三条（鸭绿江中江小西江），纵横如布练，拱抱马楛，带胡山之金石，松鹤周遭罗列楼，头俯瞰咫尺，朔气可通，呼吸之间，万里胡风，翻惹悲壮之怀，即此亭之使然也”。⁴³虽然在燕行录中不是所有使臣都记录了登统军亭一事，但是大部分使臣在登上统军亭后心里都不免产生悲伤的情感。而在权时亨路在过青石岭的时候说：“午后，踰青石岭，岩石皆青黑，如我国青石岭，而其险则犹有甚焉。昔我孝宗过此岭，有歌调甚凄切云”。⁴⁴郑元容在路过青石岭时作诗一首说：

风尘往事却凄然，岭上行人二百年。
故国苍茫何处望，宁陵歌曲至今传。⁴⁵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使臣们不断的回忆战争带给内心的耻辱以及伤痛，这一感受不断在内心强化，通过这种强化更加巩固了强国的思想。

除上述内容以外，在燕行录还有许多其他的历史记忆，本文中便不再多谈。笔者想强调的是，高句丽的历史记忆在道光时期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是针对其他的历史记忆却并没有减少，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⁴¹ 朴思浩：《燕薊纪程》，《燕行录全集》第85卷，第214页。

⁴² 李遇骏：《梦游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76卷，第380页。

⁴³ 赵凤夏：《燕薊纪略》，《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第2卷，第113页。还有朴思浩记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晴。留。清阴先生遗迹碑在统军西南岸。先生被拘沈阳也，留一年於湾上，与徐晚沙景雨，李尚书显英，同住一村，相与酬唱，名其村曰寿星。清阴诗曰：天涯邂逅接柴门，欢会依然似故园。他日龙湾輿地志，定知编入寿星村”。（《燕薊纪程》，《燕行录全集》第85卷，第243页）；金景善记到“统军亭下有寿星村故墟。仁祖辛巳。清阴自沈阳还。留此一年。与徐相国景雨，李尚书显英。适同住一村。相与酬唱。仍命其村曰寿星，盖三公年皆耆艾也。清阴诗曰：天涯邂逅接柴门，欢会依然似故园。他日龙湾輿地志，定知编入寿星村。其后村为废邱，立一碑，识其处，刻清阴先生碑五字。作屋而庇之，即苏侯斗山为湾尹时所云。（《燕轅直指》，《燕行录全集》第70卷，第286页）

⁴⁴ 权时亨：《石湍燕记》，《燕行录全集》第90卷，第376页。

⁴⁵ 郑元容：《燕槎录（诗）》，延世大学校中央图书馆收藏本。燕行录全集中只收录了郑元容日记形式的《燕行日记》，而此诗集并未收录在燕行录全集中。关于郑元容的燕行录，参见金宗镇：《郑元容의〈燕槎录（诗）〉小考》，《韩国语文学研究》第42集，2004年2月。

结论

本篇文章主要围绕朝鲜士大夫在不同时期针对高句丽认识的变化。朝鲜初期，士大夫主要以儒家的思想出发评判高句丽及安市城战争，但在壬辰倭乱以后这一想法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改变，有关于高句丽的记录也逐步增加。到18世纪，随着对高句丽强大国力的肯定以及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朝鲜士人掀起了对安市城战争以及安市城的地理位置浓厚的兴趣，并且还出现了对前人提出的凤凰城即是安市城的主张的疑问，而这一时期针对于高句丽的历史的记录也到达一个顶点。到了19世纪道光时期，士大夫依旧延续了18世纪士大夫对高句丽的认识观点，但是由于资料局限性及考证的困难性，因此并没有出现超越前人的更新的主张，相反的，由于这些原因，使得针对于高句丽内容的记录数量直转急下，但同一时期，其他的历史记录却并没有出现减少，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士大夫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兴趣正在减弱。可这一减弱并不代表士大夫对高句丽的认识的减弱，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只针对燕行录来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针对于当时的历史书，朝廷的公文，相关士大夫的文集等，综合这些资料来研究，我们才能更进一步明确当时朝鲜士大夫对高句丽的认识。